

## 一、五千年：时间轴与人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慕容博念叨了一辈子“复兴大燕”：我慕容氏乃鲜卑慕容氏后裔，昔年大燕国威震天下，子孙岂能忘却列祖列宗的基业？复儿，你须记得，我慕容氏世世代代以兴复大燕为志！

若对照历史时间线，便会发现黑色幽默。这场梦幻愿景，既不是东汉接西汉、南宋承北宋的宗室口号，也不是间隔百年的反清复明的族群执念。

当萧峰与耶律洪基结拜时，距离十六国慕容氏最后的南燕政权（另外三个是前燕、后燕、西燕）灭亡，已经过去 650 年。这时间跨度堪比从朱元璋登基直到今天的距离。

## 来时路

关于中国历史最关键的三个核心概念，都与梁启超有直接关联。

第一个概念是“中华民族”。

梁启超在 1902 年开始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最初主要指汉族，后来发展为涵盖多民族的共同体。他在 1905 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形成的，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思想。

第二个概念是“上下五千年”。

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历史》，将伏羲元年定在前 2952 年，试图将中国历史纳入《圣经》年表体系。1914 年，梁启超在《爱国歌四章》中通过“五千余岁历史古”的诗句，赋予了它民族主义的内涵。同盟会后来采用黄帝纪元（前 2697）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历史叙事的政治正当性。

第三个概念是“四大文明古国”。

1900 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作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首次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将中国与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后调整为巴比伦）并列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他将人类文明划分为河文明、内海文明和大洋文明三个阶段，其概念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丁韪良等人的“最古国”论述，但梁启超通过诗歌形式注入了鲜明的民族主义意义。1923 年历史学家柳诒徵在

《中国文化史》中明确将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并称，使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界定型。

这些概念的建构过程，反映出近代中国在民族认同、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方面的自觉重构。此外，还有“龙的传人”。这个概念则经历了从学术考据到大众传播的过程。

闻一多 1942 年发表《伏羲考》，通过人类学方法论论证龙图腾是蛇身、鹿角、鱼鳞等部落图腾的融合产物。顾颉刚则用“层累说”揭示龙形象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造型到明清帝王服饰的形态演变，共经历六次重大变异。这些学术结论在 1978 年通过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创作的歌曲《龙的传人》实现大众化传播，歌词“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成为全球华人的文化纽带。

## 解构五千年

司马迁《史记》的历史叙述体系，以《黄帝本纪》开篇，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列为五帝，之后是治水的大禹和夏商周三代。这些记载既有传说成分，也包含历史事实，有明确纪年的起点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的公元前 841 年。

在这个年份之前，已经发现有文字（如商代甲骨文），有单一事件记载（如西周青铜器铭文），但不构成“连续纪年”历史。需要注意这三个概念的区别。

晚清民国时期关于商朝是否存在的争议，最终通过殷墟考古发掘得到解决，这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诞生。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的结合，验证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证实了《史记》记载的可信度。

关于前 841 年之前的历史，国家组织过两次重大研究工程：

1996 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首个跨学科年代学研究项目，通过碳-14 测年技术、天文推算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夏商周三代历史框架：

夏朝（约前 2070—前 1600）

商朝前期（前 1600—前 1300 盘庚迁殷前）

商朝后期（前 1300 盘庚迁殷后—前 1046 周武王伐纣）

西周（前 1046—前 771）

尽管学界对夏朝仍有争议，但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城制度和青铜礼器群，证实了其早期国家的形态。

2001 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通过对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等 29 处遗址进行系统研究，对早期中国历史给出基本框架：距今 5800 年至 3500 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部分。

其中，“古国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 5800—5200 年前后）是区域文明萌芽期。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的仰韶、红山、大汶口等文化中，大型聚落开始出现社会分层，如在河南双槐树遗址的宫殿式建筑、红山文化的祭坛与积石冢，玉器、象牙器等礼器初步成为身份象征；农业与手工业发展推动聚落群层级分化，但尚未形成统一权力中心。

第二阶段（距今 5200—4300 年前后）进入早期国家成熟期。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为这一时期典型，良渚古城规模宏大，拥有复杂的水利系统和以玉琮、玉璧为核心的礼制体系，以及标志着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的社会形态；同期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城址（如城子崖）及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显现跨区域互动，玉器技术传播与资源流通加速文化融合，但良渚因环境压力逐渐衰落。

第三阶段（距今 4300—3800 年前后）是中原文明整合期。黄河中游陶寺遗址（宫城、观象台、铜器）与陕北石峁古城（巨型石砌城垣、玉器浮雕）展现剧烈社会变革，族群冲突与技术突破（青铜铸造、文字符号）并行，中原地区通过吸收周边文化精华，在二里头文化前夕形成制度性整合能力，为夏商周王朝奠定了政治与文化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想象，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可能与石峁遗址（前 2300—前 1800）的巨型石城有关；颛顼“绝地天通”的改革可能反映了良渚神权体系的崩溃（前 2300）；尧舜“禅让”传说或许与陶寺遗址（前 2300—前 1900）的权力更替存在关联。各地考古发现的“满天星斗”格局，如仰韶彩陶西传、大汶口玉器东输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雏形。

## 修史接力

《史记》之后，中华正史体系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累积和修订过程。

唐代在编纂《隋书·经籍志》时首次将《史记》《汉书》等前代史籍列为“正史”类别，当时确立的是“十三史”概念。

到了北宋印刷术普及时期，学者们在十三史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等形成“十七史”体系。明代嘉靖年间刊刻“二十一史”，新增《宋书》《新唐书》等四部。

直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校刻《明史》完成，才最终形成了“二十四史”的完整体系。

这个历时千年的积累过程，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以史为鉴”的文化惯性——每个朝代都要通过修纂前代史书来确立自身正统性，也体现了本朝的政治观点。就像宋代增补《新五代史》来强化中原王朝叙事，元代编纂《辽史》《金史》来构建多民族统绪的合法性。

民国时期编修的《新元史》与《清史稿》，作为传统正史编纂体系的近代回响，恪守纪传体例与文言书写范式，成为二十四史编纂传统的余绪。

而当代国家修史工程则以2002年启动的《清史》编纂为标志，2004年确立“新修清史”的典、志、表、图、传五体并立框架，历经十六载编纂形成134册送审稿，虽已于2018年11月完成国家层面报审程序，但因审校修订周期漫长，迄今尚未定稿出版。

中国史书体系，以二十四史为核心，包容更为多元的史书类型，形成了“纪传为经，编年为纬，杂史补阙”的多维架构。

先秦时期，《尚书》开创了典谟训诂体例，记录上古王官政治；《春秋》以编年笔法暗含微言大义，衍生出《左传》的翔实叙事与《战国策》的纵横家言，共同奠定了史籍的书写范式。

秦汉以降，《汉纪》（荀悦）、《后汉纪》（袁宏）等断代编年体接续传统，与纪传体正史形成互补；《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地方性杂史，则掺杂传说与信史，展现出多元的历史记忆。

其中争议最大的《竹书纪年》，作为西晋出土的战国魏国编年史，其“舜囚尧”“启杀益”等记载颠覆了儒家圣王叙事，揭示了上古权力斗争的血腥本质，成为解构正统史观的关键异类文本。

而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堪称特殊题材史书的巅峰，以294卷篇幅贯通战国至五代（前403—959），首创“考异法”辨析史料真伪，确立了“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经世史学传统。

## 王朝刻度尺

拆解一下夏王朝至今的4000多年。大家不妨拿出笔来，在纸上画出一个时间轴，然后逐一标注。借直观的线段对比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长度。

夏代建立至清末结束帝制的时间段中点，大致是秦始皇时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先秦的夏商周三代时间非常长，有约1814年之久。而秦始皇至溥仪，也只有2122年。

虽然秦代存在时间短暂，但其创立的郡县制、文字统一等制度成为文化基因，被汉唐继承发展，奠定了中国的“秦制两千年”。

从秦始皇到溥仪对折的重要节点，则是北宋开国——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同年，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出生了一个女孩，

名字叫林默，即后来被沿海居民虔诚信奉的妈祖娘娘的原型。这个巧合隐喻着中国从纯陆地文明向兼具海洋文明的转型。

北宋开启的“商业革命”（交子纸币、市舶司制度）与明清“白银时代”（隆庆开海、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形成了连续的发展脉络。科技史上，毕昇活字印刷（1040）、郑和宝船（1405）、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构成的创新链条，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技术传统。

具体到一个朝代中，我们同样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个王朝的各方面在存续期间上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要切断唐代时间轴来看，别被“盛唐”这个统称给迷惑了。大唐延续的 289 年，在安史之乱以后，已经进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内有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朝臣党争，外有吐蕃、回鹘等威胁。大唐疆域只是在唐高宗时期一度达到最大，随着实力减弱，就不断被侵蚀而缩小。

把唐王朝对折，中间点恰好是 762 年。这一年太上皇唐玄宗和皇帝唐肃宗先后去世，大唐彻底由盛转衰，大明宫风光不再。所以今天对唐代历史与艺术的研究中，通常又分成四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其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是不同的。

## 与世界对望

时间轴还有另一个功能，与世界史相对应。看看某个年份，世界上发生了哪些大事，会有错位的感觉。

西方有一句谚语：“人类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最大的古埃及金字塔，第四王朝胡夫金字塔距今约 4600 年，比“金箍棒”早了 500 年——“猴哥”的如意金箍棒，书中从东海龙王

口中说得明确：“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大禹治水比夏王朝建立早几十年，也就是距今 4100 多年前。

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的完成是在公元前 1776 年，这是夏王朝后期，比商汤灭夏桀早了 176 年。著名的图坦卡蒙，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他死后 20 多年，商王盘庚迁殷。在这位法老 100 年后，才是商王武丁和王后女将军妇好的时代。

列出这些对比，并不是要中外一比高低，只是站在人类世界史的时间轴上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节点。当然网上也有很多西方早期伪史论的观点，在这里不做讨论。对比的世界史时间，也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给出的。

扑克牌中 4 个 K，其实代表了欧洲历史上 4 位著名帝王。

黑桃 K 大卫王，是古以色列第二位国王。他手持竖琴，源自《圣经》中他弹奏乐章赞颂上帝的形象。他出生的年代，西周初年上演着“周公辅成王”的故事。

梅花 K 亚历山大大帝，是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他手持地球仪，象征其征服欧亚的野心和功业。公元前 323 年，这位年轻的国王意外去世。这一年的中国处于战国时代，七雄并立，齐威王、赵武灵王、秦惠文王、楚怀王……变法改革，合纵连横。

200 多年后，方块 K、古罗马的独裁者恺撒站在亚历山大的墓前时，中国已经到了西汉元帝时期，10 多年后，昭君出塞。

红桃 K 查理曼大帝，扑克牌中唯一没有胡须的国王。这位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在公元 800 年的圣诞节，被罗马教宗良三世

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这是唐德宗贞元年间，大唐与吐蕃之间正在频繁战争。20年后才立下“唐蕃会盟碑”，迎来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期。

汉传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涅槃于公元前483年，正是孔子的晚年。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取经路上的玄奘大师已经在印度那烂陀寺。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成为威廉一世国王。北宋英宗朝廷里在濮议之争，“砸缸神童”司马光呈上首批八卷《资治通鉴》。

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中世纪结束。哥伦布两岁。大明景泰四年，即将开始一场“夺门之变”。郑和去世了20年。

牛顿生于1643年，他一岁时，崇祯帝自缢于煤山。

1860年，咸丰帝病死在热河避暑山庄，慈禧太后开始走向中国政治舞台。同一年，地球另一边，林肯当选美国总统。

历史不是孤立的，是同一个时间舞台。即便那一刻山水相隔，但人类的进程是相通的，迟早要互相交流和影响。

## 相关文物

中国现存最早带有“中国”字样的文物是何尊。这件西周青铜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镇，是周成王时期的宗庙祭祀礼器，内壁铭文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这里的“中国”特指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体现了周人“择中建都”的政治理念。